

← (上接6版)

我深深地感谢他的这片好意，并请他多多费心。

见面会

当晚六点，我与北京以来所认识的、八年后再次邂逅的《大阪每日新闻》的村田君一起出了门。日本人方面，除了我们两人之外，还邀请了上次一起去的宫崎君及中国戏剧研究会的塚本君、菅原君等。我走进店内时，在暖炉前坐着一个穿黑西装戴眼镜的青年，此人即为郭沫若君。圆脸，宽额，有一双柔和的大眼睛，毫不卷曲的坚硬的头发散乱地向上直竖，仿佛一根根清晰可数似地从头颅上放射出去。也许是有些弓背的缘故，从体形外貌上来看显得有些老成。我们立即被引到了二楼的会场。接着谢六逸君来了。穿一套薄薄的、似是春秋季节西服般的浅色的西装，上衣的里面露出了羊毛衫。这是一位脸颊丰满、大方稳重、温文尔雅的胖胖的绅士。内山氏向谢君介绍了郭君。党派不同的两位头脑藉此机会互致初次见面的寒暄。然后开始了非常流畅的日语谈话。谢君说：“我认识您的弟弟。我在早稻田时曾师从他。精二先生是我的老师。”我一看他递过来的名片，背面印有 MR. LOUIS L.Y. HSIEH M. A. (DEAN OF SHEN CHOW GIRLS' HIGH SCHOOL, PROFESSOR OF SHANGHAI UNIVERSITY)。即谢君在从事文艺的同时，还担任上海大学的教授并兼神州女子高中的教务长。看这名片，以及从他稳重得体的举止和有些稀少的头发来看，使人感到已有相当的年纪了，但他说曾是精二的学生，一定还很年轻吧。但不知精二是否知道他的一个学生已在上海取得了如此的地位。

欧阳予倩推开门走了进来。白皙的脸上戴着眼镜的样子，到底是一位站在舞台上的人。一头乌发宛如漆色一般地闪烁着黑色的光泽，鼻梁线条挺拔而轮廓分明。从耳际后面一直到脖颈上的发际间的肤色尤其白皙。方光焘、徐蔚南、唐越石诸君也来了。我右面的椅子上坐着谢君，左侧为方君。在中国西服虽未如日本那么流行，但今日在座的都是清一色的西服。他们不仅对我说日语，而且自己之间也尽可能用日语交谈。我现已移居关西，已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这种用纯粹的东京话发言的聚会了。

大家都已入座、谈兴正起



谢六逸(1898—1945)，贵州贵阳人，文学家，翻译家，大学教授。1918—1922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，后回上海从事教育和文学活动，著作有《日本文学》等，译著有《日本近代小品文选》《万叶集选》等。

的时候，最后出现了田汉君的身影。说实话，我要是没听到内山氏的一声“田汉君来了”，实在不会想到进来的一个穿着素色洋装的汉子竟是中国人。我倒觉得这个人大概是东京的哪一个文人，名字一下子想不起来了，当时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。田君的容貌风采竟与日本人如此相近，而且当时的印象是与我们这些同伙别无二致。肤色黝黑，瘦削，长脸而轮廓分明，头发长得乱蓬蓬的，眼睛里射出神经质的光芒，长着龅牙的嘴双唇紧闭略无笑意。习惯于低着头竭力控制住自己的神态，都令我们想起自己二十几岁时的模样。他脸对着桌子，眼睛往上一抬扫视了一下桌边的人，目光又默默地沉落了



《新思潮》，文艺杂志，初刊(如图)创于1907年10月，小山内薰为主编和发行人，以介绍易卜生、斯特林堡等近代西洋剧为主。谷崎润一郎参加的时代当为其第二阶段，时在1910—1911年，谷崎在上面发表了成名作《刺青》。



方光焘(1898—1964)，语言学家，文学家，浙江衢州人，1914—1924年间在日本留学，后又去法国专攻语言学，回国后在各大学任教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。



徐蔚南(1900—1952)，江苏吴县人，编辑、散文家，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，有散文集和译著问世，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文献委员会副主任。



唐越石，生平年不详，是1920年代南国电影剧社、晨光美术会、上海戏剧社的重要成员。

下来，过一会儿他突然开口说：“谷崎先生，我见到您这是第二次了。”

(其时我为他的声音再次感到惊讶。这种脆爽声调不就是典型的东京腔吗?)

“是吗，你以前曾见过我?”

“是，见过。《业余俱乐部》在有乐座[1908年建于东京有乐町的日本最早的西式剧场，是日本近代新剧的重镇，1923年毁于关东大地震，1936年重建，田汉这里说的是原有的有乐座]首次上映的时候我去看了。里面有你的特写镜头吧。”

“噢，是吗?那么你是在电影中见到的喽?”

“我也知道栗原托马斯。你们是去海边拍外景吧。那时我正好去镰仓避暑，看见你们正在拍电影。”

这不由唤起了我大正电影创立时代的遥远的回忆。那是大正九年夏天的事了。那时田君恰好在日本留学。

饭桌上的话题不久转到了中国的文坛和影坛上。我最想要知道的，便是从宫崎君那里听来的有关日本的作品被大量译过来的情形，我想了解其范围的种类。我表示说，要是可能的话，希望他们尽量帮我把这些译本收集起来，我带回去作为赠给日本文坛的礼物。但据田、郭两君所言，实际上已有各种各样的筹划，日本作品的翻译，去查询一下的话也有相当不少，但许多人虽已将此译成了中文，无奈一般的读书界尚未对日本的东西产生很大的兴趣，因此就很难作为单行本在书肆上梓出版。日本的作家中最广为人所知的是武者小路氏和菊池氏。前者的作品译出的有《一个青年的梦》《妹妹》(《妹妹》是由田汉氏的门生周白棣氏翻译的，中华书局发行。《一个青年的梦》我未拿到)。后者的作品有前述的《日本现代剧选》，像样的出版物也就这些。其他的也有不时地在同人杂志

上发表的，但这些杂志寿命都很短，才出版不久就马上停刊了，因此从中收集翻译作品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他们说，不过您要是特别需要的话，在您归国之前设法收集起来给您。我说道：“原来是这样。这样说来，眼下的中国正如同我们的《新思潮》时代了。”“对，对，”田汉君性急地点头说。“剧坛方面的程度和日本那个时代一样。所以我们即使在写剧本，也不敢奢望能在剧场上上演，只是有时圈子里的人举行小规模试演。”话语中夹着不满的语气。郭君苦笑说：“总之，还处在一个令人羞愧的状态。”“这也是无可奈何的。我们也是经历了这样的时代过来的。你们若还都是二十几岁的话，今后还须得雌伏十年以上。”我再次想起了自己的往日时光，今天作为过来之人在这里与他们交谈感到很愉快。

“没有办法呀，我现在从事电影的工作，以等待机运的成熟。”

欧阳君也感慨地说道。于是就谈到了上海的电影公司。现在上海称之为“某某影片公司”的大概有四十来家，但真正拥有摄影棚的才一、两家。女演员中最近出名的张织云小姐最为走红。但日本方面的人认为，中国的电影故事过于洋气，目前尚不成熟。“这话不假，不过我所属的那家公司临时聘请了田汉君，我打算将田汉君的原作导演成电影。”欧阳君辩解说。然后说定了过几天带我到电影公司去，把我介绍给女演员们。……

大家的聊天虽未尽兴，但说好以后再相会，于是在十点彼此分手了。我留了郭君和田君，三人在街上闲逛着继续聊天。……两人一直来到了我下榻的一品香旅馆，喝着绍兴酒又继续谈开了。藉着醉意，两人都坦率地诉说了现今中国青年心中的苦恼。他们说，我们国家

古老的文化，眼下由于西洋文化的传入而正遭到人们的遗弃。产业组织受到了改革，外国的资本流了进来，琼脂玉浆都让他们吸走了。中国被称为无穷尽的宝库，虽然新的富源正在为人们所开拓，但我们中国的国民不仅未受到一点惠益，物价反而日益攀升，我们的生活渐渐困难起来。上海虽说是个富庶的城市，但掌握财富和权力的是外国人。于是年复一年，租界的奢靡之风波及到了乡村，蠢毒着地方上的淳朴的人心。农民们耕种田地也赚不到钱，而购买欲却被刺激起来了，因此就日趋贫困。我们家乡的田园日渐荒芜，农业日益衰败。究其根源，这都是外国人的行为造成的。这些话我都是初次听闻。我原以为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里虽有排外思想，但若到乡村去的话，中国的农民至今仍是无忧无虑的，“帝力于我有何哉”，对政治和外交心无牵记，吃着廉价的食物穿着廉价的衣服悠然度日。但两人满脸沉重地说，这样的情形已不复存在，乡村里的人也不像以前那样地悠然无虑了。我说，财富都集中在都市里，乡村日趋凋敝的现象是世界性的，恐怕并不限于中国吧。而且说起外国资本，主要是指美国和英国的钱财，这也已经席卷全世界了。这类经济情况我也不甚了了，但即便是日本，恐怕也被盎格鲁撒克逊的金钱之力所支配了吧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正在吮吸着全世界的琼脂玉浆，受苦受难的也许并不只是中国。中国还算国土广大，有那么多的富源在，稍微借点钱也不会有丝毫的影响，比起别的国家也许还胜一筹。

“不对。”郭君立即予以了否定。

“日本与中国不同。现在的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。日本是借了钱自己来使用的。而在我国，外国人要来就来，把我们的利益和习惯不放在眼里，他们自己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建造城市，建造工厂。我们看着他们这样做却一筹莫展，任人蹂躏宰割。我们的这种绝望的、眼睁睁地等待着灭亡的心情，决不只是单纯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。日本人没有这样的经历，恐怕很难理解，这使我们青年人的心灵受到了多大的伤害啊!因此一旦对外方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连学生们都会立刻作出强烈的反应。”

“日本的所谓中国通可并没有这样说呀。中国人在经济能力上是伟大的种族，但没有政治方面的能力。他们……

(下转8版) ➡